

國立台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我的學思歷程

第 I 集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的學思歷程：國立台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編。

-- 第二版. --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2〔民91〕

冊：公分

ISBN 957-01-0500-3（第1集：平裝）

1. 教育—論文，講詞等

520.7

91001782

統一編號 1009100281

我的學思歷程 第一集

編者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編
出版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	陳維昭
發行所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臺北市 10617 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電話 (02)2363-0231 轉 3914
	傳真 (02)2363-6905
	e-mail: ntuprs@ms.cc.edu.tw
設計印刷	集思創意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電話	02-27519900

1999年6月初版

2002年3月第二版

ISBN 957-01-0500-3

定價：新臺幣300元

國立台灣大學通識教育論壇

我的學思歷程

第 I 集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目次

陳維昭	張忠謀	李嗣涔	李遠哲	吳成文	楊國樞	序
150	116	84	58	36	6	4

黃 辜 錢
崑 振
嚴 甫 復

244 224 190

序

『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是八十六及八十七學年度由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所策劃舉辦的系列講座中的演講內容的彙整，在這本書出版前夕，因為職務上的方便得以先行閱讀書中的內容，感到非常的高興。

自從擔任本校校長職務以來，深切體認到提昇大學部教育品質的重要性，尤其共同課程與通識教育課程更是大學教育中極其重要的部分。共同及通識教育可以與專業課程相配合，提供學生較為寬廣的視野，塑造學生的世界觀，獲得整全的知識，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但是，近數十年來國內的大學教育基本上均較偏重專業知識的教導，缺少對學生所應擁有現代知識的整體觀照以及學生獨立思考與分析判斷能力的培養。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有鑑於此，從兩年前開始，擇定『我的學思歷程』作為本校通識教育論壇的主題，每學期邀請治學有成、人生歷練豐富或在產業實務上成就卓著的各界前輩、學者、專家蒞臨本校發表他們的學思歷程，以啓迪同學的思考並供做

人做事的參考。

『我的學思歷程』通識系列講座實施以來績效極好，幾乎每一場講座都吸引許多本校師生及校外人士前來聽講，我由衷期待這項通識教育講座能夠繼續推動，成為本校校園文化一個重要組成的部分。

在此我想特別感謝撥冗蒞臨本校發表演講的各位演講人，他們對本校的愛護，將使他們的演講成為台大校史中的一部份。我也要感謝共同教育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張麟徵教授及現任主任委員黃俊傑教授為這個系列講座所付出的心力。

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陳維昭

——建立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的推手
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

首先想跟各位談談，我在這四十年來的學術生涯中，有些什麼樣的轉折、挫折、樂趣，以及一些自己覺得失敗、成功的地方，這些可能是各位同學很少能在課本或論文裡看得到的。其次我想跟各位講五個重要的基本觀念，這些都是我在四十幾年的教學研究工作當中所體認到的，在這裡提出來就教於各位。

我是一九五四年進入臺大，一九五九年畢業，期間我留級了一年，留級的原因並不是功課不好，而是因為我在大二的時候得了肺病，休學一年，所以一九五九年才畢業。我們當時也有大學聯考，但是因為從大陸來台的過程中耽誤了一年，而大學又休學了一年，所以本來應該在一九五



六或一九五七年畢業的，反而拖到一九五九年才畢業。從我畢業後到現在一九九八年，還差一年就四十年了。在這四十年當中，我可以說完全都是在學術界。但其中有一段時間，我也曾把部分心思放在政治、社會、教育的關懷與批評上，因為我認為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應該要關心社會上的大事，當然也包括政治。事實上，當時的政治環境並不是很開放，所以我也經歷了不少危險。雖然中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把部分心思放在社會上、政治上所發生的一些大事情，但是大部份的時間還是在學術上面。

大二在病中，反思中國積弱不振之因，決定研究心理學來謀求改革

我之所以會走上心理學，是在一個很特別的情況下決定的。一九五四年我考進臺大森林系，但是大二的時候生肺病休學，因為家境不好，所以並沒有讓家裡人知道，就在鄉下一個朋友的家裡養病。在這養病的一年當中，我想了很多問題。當時中國社會積弱不振，出現很多問題，許多熱情的知識份子都想要改造社會、挽救民眾，這股熱情一直從大陸延續到臺灣。於是我有一個想法，認為社會改革應該要從人的方面去著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西方有很多很好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一旦傳入了中國的社會以後就變質了，所以我認為這基本上是

一個「人」的問題。因此我覺得要改造社會、幫助社會，最重要的就是要學心理學，其實當時我對心理學的瞭解是很膚淺的。

想了一年之後，我覺得我要學我想學的東西，並不在乎將來是否能夠找到職業，於是下定決心學心理學。休學回來之後，我去見森林系系主任王子定教授，當面跟他說：「我的肺病雖然好了，但是醫生勸我不要爬山。」當時王主任愣住了，不肯簽字讓我轉心理系，他要我繼續留下來唸，但是我心意已決，於是我們就這樣爭論了半天，後來他大概是覺得我很誠懇，嘆口氣只好同意了。我又去見心理系蘇鄉雨主任，要求轉系。後來他跟我談起當時的情形，他說當時看我一副很誠懇的樣子，本來就已經打算讓我進來了，但是他想測試一下我的動機強不強，後來看我流了眼淚，知道我是認真的，所以就同意讓我進來。轉進心理系之後，我唸得很認真。我之所以跟各位同學強調我唸心理學唸得很認真，而且不在乎有沒有出路，這跟我最後要講的「志業」跟「職業」有很大的關係。

畢業之後，我留在心理系擔任助教，四年之後擔任講師，後來快升副教授的時候，就出國唸書。在國外待了一段時間，獲得博士學位後，就回來當副教授。以下想將我的研究生涯分成幾個階段來跟各位談。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六年，探索心理學的眞「山」何在

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九年從臺大畢業，我並沒有馬上出國，因爲我不喜歡跟著世俗的潮流走，當時很多人一畢業就出國唸書，但我反而認爲在國內好好做研究就可以了。那個階段我做的是比較心理學(comparative psychology)中的動物行爲的研究，完全是個實驗心理學者。但此後轉而探討學習心理學，最後又改爲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所以這個時期我稱之爲探索的階段。用一個比較詩情畫意的講法來說，假如心理學是一座山的話，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座山在那裡。我一直搞不清楚心理學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很認真的做研究，也發表了不少論文。後來一九六六年我到國外唸書，進入了我的學思歷程的第二階段。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看心理學之山是山

第二個階段是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一九六六年我到國外唸書，對於知識的求取非常飢渴，就好像一塊乾海綿一樣，努力的吸收一切，什麼都學而且非常用功，所以我花了三年就把博士學位唸完了。當時我是拿行政院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前身）的獎學金出國，在

時間上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外交部在我的護照上打印了「該員出國期間三年，期滿不得以任何理由加簽」，這幾個字我現在都還記得清清楚楚。但是後來我很後悔，因為這就跟煮咖啡一樣，火候不夠、時間不夠，雖然我完成論文取得學位，但是我對美國的社會文化還沒有一個深入的瞭解。

我出國唸的學校是美國伊利諾大學，她的心理系在美國排名在前五名，教授群有七十幾位，其中大師級的教授不少，是一個龐大而相當不錯的心理系，系中教授的科目非常多，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於是我自覺懂得了什麼是心理學。將心理學比作一座山的話，我從一九六九年就覺得看山是山了，看心理學已經知道這就是心理學。我在一九六九年返回台大心理系，擔任副教授，士氣高昂，日以繼夜做研究，論文產量不少。但到了一九七三年，我的心情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對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九七三至一九八〇年，看心理學之山不是山

第三個階段是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〇年。一九七三年我開始不想做研究了，我問自己：「為什麼以前那麼熱衷做研究，現在卻又不想做了？」我開始檢討自己，想想是不是入錯行了，在

考慮了軍人、商人等種種行業之後，還是認為做學問比較適合我。其實從當初養病期間開始，我就希望自己將來能做一個學者，所以我認為問題應該是在自己的研究方面。我又看了看其他學科，我想既然以前已經轉過一次系，現在還是可以再轉系，但是最後發現我的興趣還是在心理學。就這樣，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思考，當時也沒有人可以請教，自己也不知從何說起。在經過一番反覆思考之後，終於發現是我研究心理學的方法出了問題。我回顧自己以前所做的研究題目，發現這些題目都是美國人做過的題目，他們研究的題目對他們的社會而言，意義非常重大，但是這些題目在我們的社會不一定有意義，我們卻還是照抄照搬，根本沒有思考過在中國的社會裡，到底什麼樣的主題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覺得問題不只如此，還有其他問題存在。於是我回想自己如何做研究，在做研究時的思路歷程究竟是怎樣的，這時我才發現自己過去都是套用美國人的方法，而且在做研究的時候，我都會有無意的壓抑自己的中國人的觀點。知識製造業裡的學者，在從事研究的時候，會問為什麼要研究這個問題、從什麼角度去研究這個問題、用什麼概念去概念化這個問題、它會形成什麼理論、發展出什麼方法，這些都跟那個人自己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他的思維方式、社會觀、價值觀念等，都跟他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形成怎樣的理論、發展出怎樣的方法有關。但是我們這邊的研究不是這樣，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都把這套東西給

壓抑下去，不讓它反映在自己的思考過程裡面，我們研究的題目跟我們的社會文化沒有相干性，對中國人的心理、行為及生活的瞭解，也沒有多大幫助。

當時也有學生問我：「我們上課用的英文課本，所研究的對象或知識都是以有關美國人的心理知識體系為主，但是他們的文化體系跟我們的差異相當大，怎麼可以一視同仁呢？」也有學生跟我們反應，說他到廣告公司工作以後，大學所唸的東西都沒有用處，他無法提出一個很切合實際的方案給老闆。當時只有臺大有心理系，我也不敢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因為我們向來是以實驗心理學、科學心理學為榮，也就是說以跟著外國走為榮，所以我還不太有信心去講這件事。我不敢跟別人講，我們問題的根本，在於我們沒有有效的、完整的去研究、瞭解我們自己的心理及行為，我們只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方法與結果，所以也只能測量到我們跟西方人相同的心理，其他不同的地方則看不到。我們跟西方人一樣具有屬於人類共性的心理，但是在那個年代，我們中國人還是跟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而影響我們生活最大的可能是中國人的特殊心理，所以照以前的研究方法我們根本研究不到什麼重點。我們只是盲目的套用西方的理論、方法、工具、觀念，最後所形成的研究根本是一種西化的心理學研究，所建立的「華人心理學」也不過是一個西化的華

人心理學，這個心理學根本無法反映我們中國人的心理及行爲，我們也不能根據這些東西來改革什麼，更不能解決或瞭解社會問題，提出有效的建議。於是我到中研院去，接觸一些人類學者，告訴他們我的想法，他們也都相當認同。

事實上，我從國外回來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跟人類學者接觸。人類學家在做研究的時候，相當重視當地文化，他們認為要真正瞭解一個外國文化，一定要進入那個文化裡面，甚至娶一個當地人作太太，或嫁給一個當地人。他們可能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只是在研究一個文化、一個社會，而且都不會是一個很大的社會，了不起也只能研究兩個、三個，一生的學術壽命就結束了。所以他們的研究通常都相當貼切，他們能夠融入當地人的生活，用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用當地人的價值判斷，懂得當地人的語言，而語言跟思考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他們的研究才能做得那麼貼切。但我們心理學卻不是這樣。所以我找了幾位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就在民族所討論這個問題，大家都有一個共識，覺得這是十分必要的。那個時候我們的研究稱爲「中國化」，現在叫做「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的本土化」。後來我到香港大學擔任社會學系心理學組主任。在香港的時候，我也找了十幾位學者，例如金耀基、喬健、李沛良等先生，開始討論這些問題，形成一個討

論會，每個月聚會一次，大家都覺得我提出來的問題是對的，而且也應該要思考。一九八〇年我們在中研院舉行了一個「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研討會，邀請了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的華人社會科學研究者，發表了二十幾篇論文，後來出了一本頗有影響力的書，書名是「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

第二個階段（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已經進入了「看山是山」的境界。但是好景不常，從一九七三年開始，卻又是「看山不是山」了，發現這並不是我想追求的心理學，它是洋人的心理學。從一九七三年一直到一九八〇年開了那個會，甚至到一九八一年我們出書提倡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的中國化，都是屬於「看山不是山」的階段。當時李亦園先生、文崇一先生跟我三個人，大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一直到現在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也繼續保持合作的良好關係，後來研究台灣社會科學發展史的人稱我們為「鐵三角」。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八年，心理學看山又似山

第四個階段是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一、八二年左右，我開始追求一個「真山」，

而這座「真山」一定要中國化（後來我們改稱本土化）。我們所強調的是一種本土的研究取向，也就是在研究任何一種人的心理及行為時，必須深入到他的社會文化裡面去，從他們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去研究他們的心理、行為，而不是盲目地套用西方的理論或方法來看眼前的問題，去概念化這個問題。我們不要從西方人的眼光來看，而是要以當地學者的眼光來看，我們不應該壓抑自己身上的中國文化特點，反而應該把它反映出來，放在思考裡面，從而發展概念、理論、方法、工具。當然在蒐集資料的時候，要考慮自己是不是太過主觀。我們提倡「本土化」的意思，是要在研究當地人的心理及行為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控制住自己，不要盲目的不經思考、不加批評，就套用外國心理學的東西。我們強調的是要到現象裡面去，以當地的現象為師。深入現象後，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充分瞭解現象的複雜性、具體性、獨特性。徹底瞭解之後，與現象高度契合的問題內涵與概念理路自然就會呈現出來。到這個時候，想套用外國的理論都不容易了，因為你已經融入當地的現象了。但是我們過去並不是如此，我們只是把西方的理論強加到本土的現象上去，用現象來遷就理論、方法、工具。我們臺灣與大陸、香港等地都是同文、同種、同文化，所以我們臺灣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成果，將來也可以跟大陸、香港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成果整合成「華人为本土心理學」。